

摘要

本論文是以阮元對金石研究的推動，來看在清代金石成為獨立學門以及書體研究對於書法藝術與學術議題的影響之個案研究。阮元關於金石活動最重要的文獻是〈金石十事記〉，最重要的書法理論是〈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本論文即是據此而開展。

在阮元之前的金石研究，特別是古器，現今稱為青銅器以北宋為一高潮，除了士大夫的嚴謹的學術態度外，宋徽宗據此而作的禮樂仿古，成為中國歷史的高峰。南宋以後，古器成為賞玩，甚至成為一種繪畫的題材。金石的另一類是石刻材料，從北宋歐陽修定義為歷史研究的材料之後，一直到明末才有依據石刻材料而寫成的書法史的書籍，並成為書法的臨仿範本。阮元的出現，對於金石學的發展產生的質的改變，就圖像而言，阮元之後出現一系列表述收藏「金」或「石」的肖像畫，這是過去所無。同時，阮元將「金」與「石」視為整體的概念來推動，並引發後來的學者思考金石要成為一個獨立的學門來看待，這也撼動了吾人將「金石學」常識性地認為是從北宋就是一個獨立學門。

阮元的金石學活動主要是書籍的編纂：「金」的《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與「石」的《山左金石志》，以及與對於「金」：《散氏盤》、「石」：《石鼓文》、《華山碑》這重要古物的複製。《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重要性是清代皇室之外的另一條古器收藏系統，二者幾乎無關聯性，該書呈現當時的收藏與最高的學術成就。《山左金石志》則是代表了山東訪碑文化的成熟與地方人士努力的學術成果。阮元的〈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其實是考據史學下，依據石刻材料所得到的研究成果，若將金石書法視為學術的一個面向，筆者要解釋現今的清代書法代表人物鄧石如代當時為何如此被不被受重視，以及後來為何會提升至無以復加的地位；吳昌碩書寫的《石鼓文》的自我詮釋，也要放在金文學興盛的學術氛圍之下，才得以理解。

筆者最後會探討阮元其他面向的影響雖不直接，卻深遠而巨大，如二十世紀的「蘭亭論辯」，以理解阮元的出現，改變了吾人的書法史觀。關於金石學的研究，要有充分的視覺材料才得以完成，這也正是學界對於阮元關於金石學的研究起步如此之晚的原因。